

司马光

哲学思想述评

董根洪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晋)新登字6号

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

董根洪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5 字数: 284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册

*

ISBN 7-203-02938-7

G·1215 定价: 9.20元

序

北宋哲学，因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学新阶段，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以往有关北宋哲学的研究著论中，往往限于王安石、张载和二程数人，而鲜及其他人物。而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一书，则指出了在北宋哲学论坛上，司马光也是一个与王安石、张载和二程一样重要的哲学家，司马光的哲学思想也是两宋哲学和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根洪同志从南宋朱熹曾将司马光与邵雍、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并称为道学“六先生”，今人胡适断定司马光为宋明“理学之开山祖师”得到启发，从而开始了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研究。他花费了较长时间，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司马光哲学思想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一25万字的颇具特色的专著。

这部专著有二个鲜明的特点，或有二方面的重

要价值。其一，它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司马光哲学思想的专著。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研究很少，即或有，也多仅及其自然哲学。而这部专著却堪称司马光哲学研究全书，它对司马光的自然哲学、辩证哲学、认识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哲学思想渊源和历史作用地位等等都予以了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和论述，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全面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宋哲学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宋明理学产生发展的总轨迹。其二，这部专著充满了作者精心研究的独到见解，读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赖作者对丰富资料的全面深入研究，本书能不囿陈见、敢标新立异，大胆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新颖观点。读及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可频频接触到这些与众不同的新论新说。如在“自然哲学”一章中，本书提出了与学术界公认的司马光的哲学是天命论神学唯心主义的观点正相反的观点，不仅通过司马光重人事薄天命尚人本反佛道诸论肯定了司马光是一个杰出的无神论者，而且还列举十一个方面的论据进而证实了司马光是与同时代张载一样的虚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者。再如在“政治哲学”一章中，通过对司马光的“义之为利”、“王霸无异道”的观点的阐述，论证了在两宋政治哲学争论焦点的“义利王霸之辩”中，司马光的观点最具全面合理性，从而打破了以往有关两宋“义利王霸之辩”的研究中不涉及司马光的学术传统；通过对司马光的君臣“上下皆主于民”、“法者天下之公器，虽人君不可得而私”等一系列观点的详细阐发，得出了司马光具有丰富的一系列堪与后人邓牧、黄宗羲媲美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启蒙思想，司马光是杰出的反封建专制

的先驱者的观点；还从司马光基于丰富的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和“古不今日如”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诸多方面而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思想说明了司马光不是如通常认为的是一个顽固守旧者，而是一个进步变革者。如上等等，不一而足。所有分布于各章各节的发前人之未发的新说新论，本书都能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论证翔实、分析明晰。它们虽不一定都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当可自成一家，与他家相映成辉，共成学坛“百家争鸣”盛景，共同推动对司马光哲学的进一步研究，促进对司马光理学思想和整个宋明理学思想产生发展的深入理解和完整把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一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白之绩。深信它的出版，会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欢迎。

陈正夫 何植靖

1993年1月于南昌

前 言

北宋时，中国哲学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角色——理学。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新高峰。自此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史发展三大圆圈的最后一个圆圈——宋明理学便开始其运转，在塑造理学这一新哲学形态的巨擘中，司马光便挺立其中。司马光综罗百家、推陈出新，在广承前人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理学新范畴和新命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理学的诞生。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政治的等多种原因，长期以来，司马光的这一理学开创之功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人们多谈濂洛关学，不述“涑水之学”；只知“北宋五子”，未识司马“先生”；只晓《资治通鉴》主编的司马光，不闻《潜虚》作者的司马光；只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少提理学创始人的司马光；即或近来有所论及的，也一概以“神学唯心主义”和“不变论”形而上学目之。司马光哲

学的知遇之状令人心惊、难尽人意。

笔者在读研究生期间，开始接触司马光的哲学。接触稍多，便觉司马光哲学的宏富广大。以后遂将《论司马光的哲学》定为学位论文题目，对司马光的哲学理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在导师的肯定和鼓励下，以后又加以修改补苴，便形成了现在这本拙著。

在本书中，著者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①的观点，对司马光的哲学进行如实系统的阐述评价，按照“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的原则，对司马光在宋明理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作客观全面的揭示评断。

由于才疏学浅，虽著者力求减少疏漏，然而纰缪偏颇处肯定不少，敬祈专家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以俾司马光哲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

诚挚感谢我的导师陈正夫教授、何植靖教授对本书编著上的多方指导关心，衷心感忱山西人民出版社刘德斌副总编和本书责任编辑杨建军先生在本书修改出版方面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作者

1992年冬于嘉兴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时代、生平、著作和学术渊源	(1)
第一节 时代	(1)
第二节 生平	(12)
第三节 著作	(24)
第四节 学术渊源	(46)
第二章 司马光的自然哲学	(62)
第一节 《潜虚》的“虚气”宇宙观	(62)
第二节 唯物的“太极”、“太玄”观	(85)
第三节 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96)
第四节 系列基本范畴论	(112)
第三章 司马光的辩证哲学	(120)
第一节 阴阳“变化本原”论	(120)
第二节 万物“变化有常”论	(129)
第三节 “中和之道”论	(141)
第四章 司马光的认识哲学	(155)

第一节	“格物致知”论	(155)
第二节	“行贵于知”论	(164)
第三节	认识论他论	(178)

第五章 司马光的历史哲学 (185)

第一节	“以礼养众”论	(185)
第二节	“民本”、“农本”论	(190)
第三节	“治乱之道”论	(199)
第四节	非“正统”史观	(208)

第六章 司马光的人生哲学 (216)

第一节	有善有恶的性情论	(216)
第二节	二重理想人格论	(227)
第三节	自主人生修养论	(245)
第四节	人生观诸论	(260)

第七章 司马光的伦理哲学 (270)

第一节	“礼本”道德规范论	(270)
第二节	“义之为利”的价值论	(277)
第三节	“中和”道德教化论	(291)
第四节	家庭伦理道德论	(299)

第八章 司马光的政治哲学 (318)

第一节	“礼”、“才”、治“本”、治 “要”论	(320)
第二节	“主于民”的君民君臣论	(326)

第三节	“王霸无异道”论·····	(340)
第四节	中和“损益”变革论·····	(345)
第九章	司马光哲学的作用与地位·····	(360)
第一节	司马光哲学在理学诞生中的作用·····	(360)
第二节	司马光哲学的特点·····	(382)
第三节	司马光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392)
第四节	司马光哲学长期沉落的原因·····	(400)
附：	主要参考书目·····	(420)

第一章 时代、生平、著作和学术渊源

第一节 时 代

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恰值北宋中期，这是一个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特殊时代。

在经济上，一方面是农工商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却呈现出“积贫积弱”的局面。北宋承唐末五代开国以后，积极发展农工商经济，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六十年的时间，经济上突飞猛进。农业上，由于彻底实行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结束了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对部曲佃客的直接人身控制的荫庇制，农民不再是没有户口的“徒附”，而是在籍的“客户”。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由。他们“转徙不定”，具有一定的租佃退佃的权利。这一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农民地位的相对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北宋前期，政府具体采取了鼓励垦荒、减轻赋役等措施，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猛进步。比之隋唐，在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种植面积的扩大、经济作物的增植、优良品种的推广、单位产量的提高、农业人口的增

加等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而迅速的进步和发展。如垦田数，宋太祖开宝九年为295万多顷，至司马光出生初的宋真宗天禧五年，便猛增至524万多顷，45年间几近增加一倍；从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看，分别比唐代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强和翻了一番多；就人口增长而言，北宋统一时，全国只三百万户，至仁宗嘉佑六年，已增至一千一百九十多万户。中下主户的自耕农和客户的佃农的绝对数量都大大增加了。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同时又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促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工具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的农民已有了型号齐全轻巧耐用的铁铧、铁耙、耢头、锄头、铡刀、镰刀等生产工具，这些也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稻谷等主要农作物南北广种，优良品种不断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茶桑麻甘蔗等都成为广大农民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很多农民以此为生，出现了不少专业的茶农、桑农和蔗农。农业向广度深度发展了。

北宋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农业经济上，还体现在发达的工商业上。北宋的手工业经济非常发达，无论是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其数量、规模和分工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普遍出现了较高发展形式的手工作坊，成立了多种行会组织。有的手工业作坊中，作坊主雇佣着百名以上的工人，生产过程分十几道工序，分工十分复杂。这种以分工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①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北宋的手工业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40页。

地步。在矿冶业、陶瓷业、造船业、兵器制造业、纺织业、文具制造业等生产领域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钢铁铅锡等的产量是世界上最高的；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的陶瓷产品至今令人赞叹不绝；造船业的发达也是世界各国无法相匹的。当时通往高丽的民间客舟，船身长十余丈、深三丈、宽二丈五尺，可载重二千斛。而官府所造的航海“神舟”，“皆三倍于客舟”。其余手工业的发达莫不如此。

北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带来北宋商业的繁荣。各种用以商品交换的坊场墟市迅速增多，商业城镇大量增加。这种商业的繁华景象在都城开封得到典型体现。开封在神宗时，人口达百万以上，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其时如《东京梦华录》所载：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商人云集，处处车马阗拥，时时人声鼎沸，“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这种盛景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也得到了形象逼真的反映。其他如洛阳、大名、应天、杭州、苏州、扬州等也都是商业繁庶的城市。

北宋这一建立在土地自由买卖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导致了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而所有这些又必然引起封建社会原有秩序发生一系列的新变化，而正是与这些新变化相适应，一种新的哲学——理学便应运而生。

北宋虽然在农工商经济上获得巨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并未给北宋带来长期的国泰民富的局面。至司马光出生时的真宗末年，已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至司马光稍长的仁宗朝上，“积贫积弱”之势已是非常明显了。司马光称

当时是“灾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①，活脱脱一幅公私交困，内外皆危的惨景。导致北宋贫弱之势的主要原因即是“三冗”的“冗官冗兵冗费”。“近日官吏繁冗、十倍于国初”^②。对庞大的官吏队伍，政府不仅给以优厚的俸禄，而且还包供衣粮茶酒厨料薪炭等一应生活资料。冗官冗吏之外，又有冗兵冗费，军队人数至仁宗庆历年间激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多，“拥百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③。再加宋真宗起，皇室挥霍无度，滥赏豪赐成风，如仁宗死时，除隆丧厚葬外，罄其所有按品级赏赐官吏，国库“累世所藏，几乎扫地”。更有对辽夏的沉重“献纳”。所有这些，都使北宋财政日益吃紧，虽频频对农民增赋加税，仍无济于事。至仁宗时，收支已无余积，而至英宗时，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天下之势危如累卵”^④，严重的“积贫积弱”危局，使社会改革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变革的时代精神，必然铸造出充满变革精神的时代哲学来。

在政治上，一方面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另一方面却是君主专制的有所削弱。北宋王朝建立初期，宋太祖吸取了唐末五代之乱的历史教训，决意改变五代以后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局面，于是就在“权”“钱”“兵”三方面加强统

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以下简称《传家集》）卷三六，《乞罢详定宰臣押班札子》。

②《传家集》卷二八，《论进贺表恩泽札子》。

③梁启超：《王荆公》，中华书局出版。

④《传家集》卷二七，《上皇太后疏》。

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政权、财权和兵权收掌于中央特别是皇帝一人手中，以强干削支的方法矫正了唐末五代的“尾大之弊”，使中央集权得到强化，但由于中央集权的过分绝对化，便使一系列的专制措施带来了众多的弊端，结果造成了朱熹所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竭，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①。使王朝统治遇到新的麻烦。而且因新的经济关系诸因素，宋王朝的集权统治在制度措施上似乎得到了加强，但实际上君主专制在内容上却有所削弱。由于北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私有化，使宋代的地主，公然以“田主”自居，不再承认古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那种皇帝对土地的拥有权了，皇帝专制的领域受到了限制。同时，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固有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开始渗入人心。不仅自耕农，甚至佃农也开始从商品交换以及颇多的主户降为客户，客户升为主户而上下变迁的事实中产生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意识。同时，一向被视为“浮末”“贱者”的工商业者的地位明显上升。工商业者成为“坊廓户”，正式入籍，工商业者的弟子已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工商业者的入仕之禁也已宽弛。工商业者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一部分开始入仕为官，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官吏下海为商。工商业者开始与权力发生关系。工商业者地位的上升，给封建固有的专制等级统治秩序吹来了强劲的变革和平等的春风，“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命的因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①同时，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也向平等化方向发生了变革，原有的等级界限逐渐淹没，品官子弟垄断学校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宋时的太学不仅招收下级官僚子弟，而且招收庶人子弟，包括工商业者的子弟。在科举上，不仅农工商子弟有应试之权，且朝廷还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如宋太宗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谿，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向皆登进士第，但宋太宗认为：“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②这充分说明了在教育用人方面专制性的弱化、等级制的淡化。而由于科举取人的盛行，门阀士族制度的铲除，从而出现了地主阶级内部阶层间升降浮沉频繁的现象。上品下品隔如鸿沟的情景已成历史。今日为乡户，明日升官户，父亲居高官，儿子降平民，已非罕见。这样，世袭等级制的旧观念也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可能性上官户乡户间的通变平等性。在政治上专制性的削弱、平等性的加强还表现在，北宋皇帝虽然从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以根绝藩镇割据的措施，但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五代短命的惨局，他们也更加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凡事不敢胡作非为，注重群臣百姓的意愿，避免过分的专制统治。上述在进士及第问题上，宋太宗抑势家、举孤寒，意恐公众讲他“有私”的心态就正反映了这一情况。皇帝不敢“有私”，主张势寒平等。如果说，连太祖太宗这样刚勇恢宏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1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正月己未条。

开国皇帝都惧怕“有私”，注重平等的话，那么对于后来“守成之君”来说，就更不敢公然“有私”，更不敢大行专制了。事实上，从仁宗皇帝起，北宋的皇帝在嗣立、赏罚、甚至公主婚嫁诸公私大事上都难以有自主专制权，更多地受制于周围大臣的意志。宋神宗时，重臣文彦博曾向宋神宗慷慨坦诚：“为与士大夫共天下”^①！典型地道出了北宋中期君臣共治天下的统治格式。君主难得专制、大臣有权参政，这说明了在北宋，在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基础上，在小农经济和工商经济的发展下，主户与客户、官户与乡户、君主与群臣的关系已与唐代中期有了较大变化，相互之间在地位上发生了平等化趋向。当然这种平等化的程度是有限的，是以封建君主的至上性和封建秩序的等级性为前提的。这样的政治形势，就要求产生出一种既能维护一般的封建政治统治，又能反映时代的通变性和平等化特征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来与之相适应。

北宋前期的统治者一方面欲加强其思想统治，建立一种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未能实际有效地确立起一种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中唐以后长期的分裂混乱的局势之后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混乱时期，封建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在离乱的五代，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有之；朝秦暮楚、时附时叛者有之；拥兵自重，割地称雄者有之；争当儿皇帝卖国贼者有之，其时真谓是“三纲五常之道绝”^②、“君君臣臣父父子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

②《新五代史》卷一七。